

◎書評

社會階級事關重大——評介 A. Lareau 《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 與家庭生活》

楊巧玲*

壹、序言

在臺灣，近幾年來「M型社會」這個詞彙逐漸取代「貧富差距」，而「提升競爭力」幾乎成為「全民運動」，社會階級的差異及其對個人所造成影響彷彿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在美國，主流的論述也傾向於視個人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事實上，「階級」幾乎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只要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的「美國夢」才是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所抱持的信念。儘管如此，社會學家A. Lareau於2003年出版的*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一書中，細膩而有力地描繪、對比處於不同社會階級位置的家庭如何教養子女，而不同的教養邏輯與實務又如何影響個體的生命經驗與機會，對於一向關懷、追求教育機會

* 楊巧玲 Chiao-Ling Yang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mail: yangcl@nknucc.nknu.edu.tw
本文評介 Lareau, A.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均等的教育社會學領域而言，本書堪稱經典之作，獲獎無數，^❶值得推介。以下分為：問題意識與理論觀點、研究取徑，以及主要發現加以介紹，最後提出個人省思。

貳、問題意識與理論觀點

「美國可以說是機會之地，但也充滿著不平等。」^❷（頁3）長久以來關注不平等的社會現象的Lareau如是說，她的研究致力於揭露社會階級如何對個人發揮影響力，本書也是繼*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1989年初版，2000年再版）之後又一力作，目的在於指陳父母的社會階級如何以一種不易看見卻又強而有力的方式，影響子女的生活，甚至一生。何以不易看見卻又強而有力？作者認為，日常生活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的，換言之，人們是在一個社會結構之內展開其日常生活，她在第2章一開始就引用C. Wright Mills的一句話：「一個人的生命無法被充分地理解，除非參照其傳記得以發生的典章制度。」^❸（頁14）如果有人覺得「典章制度」過於抽象，Lareau簡要說明：個人在所屬的團體中有各種不同的位置或地位，並且遵循規範（norms），或是規則系統（rule systems），長久下來，某些規則系統就聚合而成典章制度，舉凡婚姻、家庭、軍隊、企業、政黨、種族隔離等，都是典章制度的例子，她進一步地指出，個體與特定典章制度互動的機會並不是偶然的，家庭富裕者所往來的通常是服務菁英的機構，

❶ 包括 2004 年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不同分支的獎項：家庭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童年與青年、2004 年的 C. Wright Mills Award，以及 2003 年的 Critics Choice Award。

❷ 原文如下：America may be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but it is also a land of inequality.

❸ 原文如下：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cannot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without references to the institutions within which his biography is enacted.

而家境清寒者則多與服務窮人的組織交涉，簡言之，孩童成長於一個高度階層化的社會之中（頁14-15）。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Lareau援引已故法國著名學者P. Bourdieu的理論觀點，在附錄B中，作者直言，為了提高可讀性而避免使用Bourdieu的術語，但是本書其實是其理論觀點之實徵應用（頁276）。為何做此選擇？Lareau宣稱，因為Bourdieu的作品有助於檢視社會階級位置的影響，對她而言，Bourdieu的基本主張是：不同社會位置的個人以不同的方式社會化，這個社會化的過程會使孩童形成一種什麼是舒適自在、理所當然的感覺，這種感覺會延續到長大成人，而這些背景經驗也會形塑個人所繼承與倚賴的資源的數量與形式，正是這些資源使個體在遭逢各種不同的制度性安排時有不同的行為表現，這個基本主張所串連的就是Bourdieu的三個核心概念：慣習（habitus）、場域（field）、資本（capital）（頁275-276）。Lareau認為，Bourdieu的作品提供了一個結構不平等的動態模式，使研究者能夠捕捉文化與社會的再製，可惜的是，Bourdieu的實徵研究尚未充分地注意到擁有資本與活化資本之間的差異，而本書便企圖彰顯個人如何利用以階級為基礎的資源與不同的社會機制互動，詳言之，作者想要探究到底不同階級背景的父母，如何傳遞文化資本給子女，並為子女帶來何等影響。

參、研究取徑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觀點，Lareau選擇以小學中年級學童為對象，進行密集的田野研究，理由是這個階段的孩子年紀夠小，以至於父母的介入還明顯可見，同時，他們也夠大以至於被賦予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但卻尚未受到同儕的深刻影響。整個研究計畫始於1990年，作者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公立小學與31位小三孩子的父母進行訪談，其餘57位學童則取自東北部都會區的小學，

共計88位小朋友，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便是其中的12位。

作者自陳，本來的設計僅止於針對白人進行跨階級的比較，但是由於Lawrenceville學區（化名）的實際狀況是，很多學校裡的白人與黑人學生各佔一半，另一方面，已有不少黑人家長抗議學區對黑人學生的需求不夠敏感，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影響正是本研究的旨趣之一，因此，沒有理由排除黑人家長。至於階級的劃分，本來Lareau只分成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該學區中，很多學校裡都有為數可觀的學童倚賴政府補助，於是作者添加了一個類別，稱為之貧窮家庭。事實上，Lareau深知有關階級的概念與測量，在社會科學界尚未形成共識，例如：有些學者主張把階級細分，但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厚實描述家庭生活的樣貌，而且要跨階級、種族、性別加以比較，勢必僅能涉及少數樣本，因而細分階級並不可行也不合理。

資料蒐集持續數年之久，作者在附錄C的表9（Table C9，頁286-287）提供過程概覽，詳細的研究方法則在附錄A中有所說明（頁259-274）。大致而言，作者選擇種族上融合而階級上相對同質的學校，在取得管道之後，先在教室中進行觀察，透過教師對學生的瞭解，挑定參與對象，接著取得父母的同意並分別與父母進行訪談，而教室觀察與父母訪談是之後進入學童家庭參與觀察的重要基礎，畢竟就像Lareau所言，進入家庭從事田野工作是很不尋常的（very unusual）。

肆、主要發現

從上述研究取徑的說明，不難想像蒐集所得資料之豐富度，本書聚焦於密集觀察的12個家庭，包括：中產階級、勞工階級、貧窮家庭，以及白人、黑人各2個家庭，共分成三個部分進行描述與分析，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其次是語言的使用，最後則是家庭與機構。

在日常生活組織方面，作者發現，不同階級背景的孩子過著截然不同的童年生活，最顯著的差異在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由成人安排各式各樣的休閒活動，而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子女則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活動。本書第一部分包括三章（第3至5章），每一章著眼於一個家庭生活的深描，分別是：白人中產階級男孩Tallinger、黑人勞工階級男孩Taylor、白人貧窮家庭女孩Brindle。儘管如此，作者宣稱這些家庭在88個樣本中具有代表性，而且階級的差異遠比種族、性別來得顯著；換句話說，無論白人或黑人、女孩或男孩，只要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都參與多種由大人安排的課外活動，諸如：足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壘球隊、游泳隊、體操隊、童軍團、合唱團、鋼琴、吉他、小提琴、薩克斯風等，因此這些孩子的生活顯得相當忙碌，更精準地說，整個家庭的生活都因隨著孩子的作息起舞而顯得十分匆促，在難得的空檔中，孩子所從事的活動大抵包括：玩電動遊戲、看電視、聽音樂、造訪同學等；相對地，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子女很少參與正式的組織性活動，如果參與，多僅止於學校或教會提供的課程，且多為免費，諸如：聖經研讀、主日學校、學校合唱團或樂隊，而且這些活動未必總是定期舉行，事實上，這些孩子會花更多的時間從事不正式的活動，最普遍的包括：看電視、造訪親戚、與鄰居、手足或堂（表）兄弟姊妹一起玩耍。

在語言的使用方面，作者發現，親子之間的討論是中產階級父母養育子女的標準印記，第6章就是以一位黑人男孩Alexander的家庭生活為例加以說明，例如：在接送孩子前往各種活動的途中，Alexander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常會與他談論學校的生活，這樣的談論不只有助於瞭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也有利於促進孩子的表達能力，事實上，Alexander的父母，就像許多其他中產階級的父母一樣，往往藉由談話來培養孩子的推理與協商的技能，同時也藉由談話進行管教（*discipline*）；換言之，父母以說理的方式引導孩子，若

有要求，會對孩子解釋理由，從未出現命令、斥責、體罰；相對地，語言在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親子互動中，並未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第7章便以一位貧窮家庭的黑人男孩Harold的家庭生活為例加以說明，作者指出，在Harold的家庭生活裡看不到口頭討論的景象，成人對小孩的用語既簡單又簡短，語言被視為日常生活的實用工具，而非用來培養推理技能或表達情感與想法，至於在管教方面，父母通常直接發號施令，且伴隨著進行體罰的威脅，不像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會追問、質疑父母，甚至與之爭論，在勞工階級及貧窮家庭中，往往是大人說、孩子聽的互動模式。

在家庭與機構的互動方面，是作者著墨最多的部分，以四章的篇幅（第8至11章）分別呈現中產階級黑人女孩Stacy、中產階級白人女孩Handlon、勞工階級白人女孩Wendy、勞工階級白人男孩Billy的學校生活，以及他們的家長如何與學校互動。Lareau發現，中產階級的家長，尤其是母親，會積極監控、批評並介入子女的學校教育，最顯著的莫過於對子女的抱怨之重視，例如：Stacy覺得體操教師的教法不適合她而向母親發牢騷，Marshall太太並不僅止於教導Stacy如何回應，之後還不斷地關注、追蹤此事，直到得到滿意的結果，而Handlon太太則要求教師不要派給女兒Melanie太多功課，以免使孩子備感挫折、減損自信，儘管教師的歸因是，Melanie本身有學習上的障礙。相對地，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一般而言對學校教育人員相當尊重，因為他們相信教育人員的專業，就像Wendy的母親，充分配合學校與教師的各項要求，包括簽名同意讓女兒接受學習障礙的診斷測驗；另一方面，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教養策略往往與校方有所衝突，例如：Billy的母親教小孩在學校遭人攻擊時要還手，在家裡必要時也會鞭打小孩，這樣的作為已違反學校的規定，也不符當代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論點。

在厚實描述不同階級家庭的日常生活組織、語言的使用，以及與機構互

動的同時，作者經常進一步地探討不同的教養邏輯與實務為孩子帶來何等的影響，最為顯著的就是，中產階級子女逐漸形成權利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例如：從家長與學校交涉的過程中，孩子直接或間接地被教導如何與有權勢的個人、單位協商，勇於要求對方配合，以爭取自己的權益。這種權利意識並非虛幻，而是搭配著語言的技能，由於中產階級父母經常使用語言和孩子互動，教導他們運用證據說服別人，事實上，親子之間不時談論著語言文字的多義性，無形中豐富了孩子的語彙，增進各類知識，也使其常有機會表達想法，這樣的技能對其未來與機構或組織的互動是有所助益的，而這種助益並非偶然，從日常生活的組織，也可看出中產階級的父母費盡心思開發子女潛能，並為孩子未來進入職場做準備，例如：參與運動團隊，習得如何競爭、合作、表現，能與熟人共事，也能與陌生人互動，特別是與權威人士見面時的握手寒暄、注視對方等社交禮儀，是其將來謀職面談的最佳利器。

相對地，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子女逐漸形成限制感（sense of constraint），不像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把參與所費不貲的課外活動視為理所當然，在日常生活中，這些孩子經常耳聞、目睹大人為了金錢的事情煩心，諸如：繳不出房租、食物券用盡、無法買新衣等，居住空間通常狹小、擁擠。這種限制感不僅止於物質條件，在語言的使用上亦然，由於家中的成人與孩子的口語互動相當有限，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子女難以發展出大量的語彙，也少有機會練習提出己見，事實上，在家庭生活裡，他們大抵聽從父母的指令，這樣的聽從也延伸到家庭之外的生活，例如：學校，從父母與學校的互動中，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子女直接或間接地學到尊重專家權威，即使想要挑戰，也是力不從心。

Lareau 將中產階級父母的教養稱為「協調一致的培育」（concerted cultivation），亦即致力於孩子的心智發展（developing the child），而將勞工階

級與貧窮家庭父母的教養稱為「順其自然的成長」(*natural growth*)，亦即致力於讓孩子就是孩子(*letting the child be child*)，本書的前兩章就直陳並對比這兩種教養方式，最後一章(第12章)則探討社會階級的影響與限制。作者認為，在家庭中，這兩種教養方式各有利弊，並無絕對的優劣，但是因為家庭之外的典章制度，例如：學校系統偏好前者、貶抑後者，因此，中產階級的子女較易得到好處，而這些好處往往不易被看見，本書的主旨就是，要讓中產階級父母如何傳遞階級資本給下一代被看見，儘管階級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但是對學童的未來仍是舉足輕重。

五、省思

本書從問題意識的陳述、理論觀點的擇取、研究方法的採行，到研究結果的呈現，都能連貫融通，並抱持對社會階級不平等的關懷，走進學童的生活世界，包括從學校、家庭中，進行民族誌的研究，費時甚久，著實不易。回顧國內的研究情況，雖然有關Bourdieu及其著作的引介已有一段時日，相關的實徵研究則多為量化調查，類似本書的研究取徑相當罕見，因此，本書可望對國內的研究者有所啟發。

儘管如此，筆者發現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是，中產階級的父母是否對自己的教養策略及其可能的影響有所覺察？作者似乎傳遞了自相矛盾的訊息，在第239頁，作者提到，無論什麼階級，養育子女的實務顯得如呼吸般地自然，即使為了教養子女而費盡心血，中產階級父母似乎很少意識到他們正在引導子女朝某個方向發展，但是在第249頁，作者則表示，在美國，中產階級的父母非常能夠體認中產階級的「運氣衰落」(*declining fortunes*)，擔憂自己及子女未來的經濟處境，這樣的不確定性使他們更致力於培養孩子各種能力，以提升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其次是社會階級的重要性真的絕對大過種族、性

別的影響嗎？根據對國小中年級學童的生活蒐集所得的田野資料，作者給予肯定的答案；然而，會不會受作者所持的理論觀點所影響？雖然本書的副標題並列階級與種族，但是作者對於種族的處理顯然較為薄弱，雖然在內文裡宣稱對比不同性別的學童，但是作者對於男性學童著墨較多。

這樣的提問並不否認社會階級的重要性，事實上，階級差異在臺灣已是不爭的事實，2003年3月24日發行的第800期《商業週刊》就以「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為題，報導居住在臺北市敦化南路高級住宅區的小六學生豆豆與出生在南投縣民間鄉務農家庭的小如，過著天壤之別的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階級差異已不斷擴大，如最近報載（2009年8月21日）主計處剛出爐的調查報告顯示，臺灣貧富差距惡化，去年居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家庭所得，是最低所得家庭的6.05倍，創下近五年新高。由此可見，社會階級的確事關重大，值得教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持續關注、投入研究。